

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DEADWOOD XIAO SHI
GONGJUAN

2

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1980·2

北京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一九八〇年·

目 录

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

左翼文艺创作的巨大成就	马良春 张大明	(1)
一个“左联”盟员的回忆琐记	沙 汀	(24)
“左联”回忆片断	草 明	(34)
回忆北平作家协会及其他	王西彦	(40)
回忆郊祭李大钊同志	端木蕻良	(54)
新球剧社的前前后后	魏照风	(60)

作家作品研究

莎菲在幻灭、追求中获得新生

——兼评姚文元的《莎菲女士们的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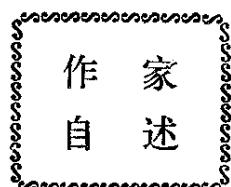
王国》及其他	张辽民	(65)
评徐志摩的诗	陆耀东	(93)
《阿Q正传》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邵伯周	(133)
鲁迅与进化论	钱理群	(155)
初期白话诗简述	向 远	(180)

第二辑（总第三辑）

- 论叶圣陶短篇小说的艺术特色 杨义 (201)
论郁达夫的小说创作 温儒敏 (223)

札记·随笔

- 鲁迅日记中的冯雪峰 刘增人 (247)
《呐喊·自序》随笔 [香港]曾敏之 (266)



- 张天翼 (276)
师陀 (281)

作家传记

- 记萧军 阎纯德 白舒荣 (285)

资料

-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潘村 (312)
萌芽月刊 沐明 (318)
北斗 沐明 (320)
台湾现代文学一瞥 张葆莘 (323)

-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学术讨论会在包头举行 (311)
告本刊作者 (342)

左翼文艺创作的巨大成就

马良春 张大明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二辑发表文章，介绍了左联在文艺理论方面的贡献。本文试图谈谈左翼文艺在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至今已经五十个年头了。从左联成立前的准备阶段算起，到左联的解散这一段历史，常常被人们称为“左翼十年”。

左翼十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光辉的十年。

十年中，左翼文艺界以共产主义者鲁迅为旗手，由广大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组成一个强大的阵营。这个阵营人数众多，力量强大，不管是创作、批评、理论、翻译等各方面，都有得力的人。十年中，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刊物，在高压之下曲折生长，在“围剿”声中傲然挺立。从《创造月刊》、《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月报》、《海风周报》、《大众文艺》，到《拓荒者》、《萌芽月刊》、《前哨》（《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月报》，以及《作家》、《文学界》、《光明》、

《中流》等几十种文艺刊物，国民党封不住，禁不了，成为新文艺大军战斗的阵地。不仅刊物，各种文学丛书也叫人应接不暇。如果说开初的“太阳小丛书”、“拓荒丛书”还规模较小不免幼稚，那么，到了十年的后期，那“奴隶丛书”、“良友文学丛书”、“开明文学新刊”、生活书店的“创作文库”和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无疑是文苑荟萃，叫人美不胜收。这些刊物，这些丛书，各出版社、书店的出版物，都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十年中的创作，不管是文学还是艺术，又无论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戏剧，都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

纵观十年，左翼文艺创作上的成就，主要特点是：主题的不断深化，题材的丰富多样，艺术技巧的不断提高。

一、主题的不断深化

“五四”十年，或者主张个性解放，表现自我，冲决封建牢笼；或者主张艺术为人生，揭露时弊，唤醒国民的精神。那气势磅礴的呼喊，那提起疗救注意的“问题小说”，在暴风雨般的狂飚运动中，是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的。但是，那一时期的作家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动力的认识毕竟还比较朦胧，因而文学作品的内容和革命的现实还没有水乳交融；尽管这些新文艺作品也为青年学生争相传阅，起到了引导他们反抗封建、走出家庭、蔑视礼教的战斗作用，但是，它总还跟现实的革命斗争有着相当大的距离。而到了左翼十年，文艺创作与革命斗争结合的自觉性增强了，所起的作用远非“五四”十年可比。正象鲁迅所说，“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今天和明天之交发生，在诬蔑和压迫之中滋长，终于在最黑暗里，用我们的同志的鲜血写了第一篇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

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它“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①。与时代合拍，和革命的方向一致，跟人民大众有一样的命运，起到一个方面军的作用，这就是左翼文学的历史功绩。

左翼文艺创作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是，作家们努力反映农村生活，歌颂土地革命，描写武装斗争。仅就人们熟悉的作品就有：华汉的《地泉》，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洪灵菲的《大海》，戴平万的《村中的早晨》，楼适夷的《盐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胡也频的《同居》，冯铿的《红的日记》，应修人的《旗子的故事》，茅盾的“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丁玲的《水》，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张天翼的《菩萨的威力》，叶紫的《丰收》、《火》、《电网外》、《向导》，洪深的《五奎桥》、《香稻米》、《青龙潭》，王统照的《山雨》等等。这些作品就单个说，只反映农村社会的一个方面，或者是山村的一隅，或者是革命的一个横断面，但合起来，就是一幅农村破产、革命发生发展的壮丽图画。这些作品没有停留在客观的表述，而是进一步挖掘造成灾难的根源，从根本上接触到了反帝反封建的主题，从中揭示了人民所以要革命的原因。象老通宝、云普叔那样逆来顺受，其结果只能是财主必欲从农民的烘笼把上也要榨出水来；象老罗伯、王伯伯那样寄希望于统治者发善心，得到的不过是财主们的一副黑心肝；去走个人奋斗的路吧，殊不知再多的粮食也填不满地主的血盆大口；或者铤而走险，单枪匹马却改变不了地主阶级的统治。所有挣扎都无效，生活叫农民认识到了真理。经济地位所决定的阶级意识由朦胧到清醒，由自发到自觉，懂得了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对抗，明白了个人

^① 鲁迅：《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二二一、二二二页。

和阶级的出路。农民的反抗是逼出来的，单个人的自发斗争不能获得阶级解放是从失败当中总结出来的。《大海》里的三个农民，什么路都走过，最后在农村土地革命的大海中才找到了真正的归宿；戴平万笔下的憨厚老农民老魏，开初那么反对儿子去革命，当他经过革命政权的熏陶之后，才懂得儿子们的行动的意义，因此，在回村的路上，身披霞光，满眼生机。

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中国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受苦的农民要翻身求解放，也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拿起武器进行斗争。三十年代的这些作品，再也不是牧歌式的田园诗，而是泪和着血，鞭影加枪声，以如火如荼的画面，展示出城乡配合，南北辉映的革命情景。这情景展现给我们的是：群众运动的大海，武装斗争的汹涌波涛，咆哮的土地，欢乐的山村。在饿火燃烧的逃荒的人流中，长工张大哥警醒地喊道：这世界就是吃人。有钱人，当官的，不会有善心。“怕什么人？起来！拼它一拼，全不过是死呀。”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甘心的听他的指挥”，“于是天将朦朦胧亮的时候，这队人，这队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女人也跟着跑，吼着生命的奔放，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过去。”（《水》）这是锐不可挡的革命洪流。这个洪流，一经有了组织，有了党的领导，更能冲决一切罗网。在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先进分子的组织领导下，用多种形式揭露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识破其种种阴谋诡计，破除天命观，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组织农会，对地主恶霸、土豪劣绅展开斗争，从抗租抗捐到开仓分粮，到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有声有色，天翻地覆。农民伸直了腰，成了中国土地上的主人。这，在洪灵菲、蒋光慈、叶紫、茅盾的作品中都作过不同程度的艺术概括。

尤其可贵的是，不少作品还展示了一幅春光明媚的远景。成就

伟大事业的农民英雄，始终怀着旧社会必然灭亡、新社会必然诞生的坚定信念，真理在握，光明在前，情绪高昂，生活乐观。革命以后的农村，阳光窥探大地，鸟儿在林中欢跳，泉水的声音也都富于音乐感，人们唱歌、跳舞，脸上挂着笑意，内心充满喜悦。革命改变着阶级关系，改变着政权的性质，改变着人们的精神面貌，一句话，革命改变着一切。个别革命作家（如胡也频、冯铿）还作了直接描写红区生活的尝试。在那里，一切都是新的：虽说还是原来的普通农民，却装进了新的思想；虽说还是原来的土地房屋，却产生了许多新的事物。在苏维埃农村，有农民自卫队，而无私斗，建立了供销社和信用社，举办了学校，解放了妇女，实施劳动法，到处贴满标语，由医生代替了巫婆，还有交通站和俱乐部^①。这些，都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新事物，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有的作品，象《咆哮了的土地》，向人们指出最后的出路在井冈山（书中用的是“金刚山”）。

左翼文艺作品，用形象描绘了革命的历程、革命的道路。这是一条通向井冈山的胜利道路。事实雄辩地说明，十年内战时期的革命特点，决定了左翼文艺创作的生活内容。反过来，这创作，又在一定意义上帮助人们认识生活，从血泊中抬起头来，拿起武器，去进行斗争。

反帝，是“五四”文学的光荣传统；到了三十年代，这个主题就有了很大的发展。如果说，象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和“农村三部曲”一类作品，反帝色彩还不够浓厚的话，那么，在“九一八”和“一二八”之后，反帝的主题就十分鲜明突出，占了左翼文学的很大比重。左联在《告无产阶级作家革命作家及一切爱好文艺的青年》的文告中，号召一切革命的进步的作家都尽

①洪灵菲：《大海》，一九三〇年三月十日《拓荒者》第三期。

可能地把自己汇入抗日的洪流。作家们在侵略者枪声的动员下，响应左联的号召，他们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发挥各人的特长，积极写作抗日作品。《文艺新闻》的《烽火》特刊最先以文字渲染抗日的气氛，柳倩的《震撼大地的一月间》可称“一二八”的抗日史诗。艾芜的《咆哮的许家屯》以生动的文字，磅礴的气势，及时地报导了东北土地上的抗日枪声。尽管这篇小说不是艾芜的佳作，但在发表之时，却震动文坛，在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蒲风的抗日诗歌富于鼓动性，表现了中华儿女的伟大爱国精神。这是诗人的誓言，也是我四万万同胞的心声：

我带回了发动机的热和力，
我要把魔鬼当柴烧，
我要配足马力哟，
我的力的总能
要象那五大海洋的怒潮！
我不问被残杀了多少东北同胞。
我要问热血的中国男儿还有多少。
我要汇合起亿万的铁手来呵，
我们的铁手需要抗敌，
我们的铁手需要战斗！

——《我迎着狂风和暴雨》

迎着狂风暴雨，武装田地山河，都市和城镇也要“无条件地让它们来共枕干戈”。民族气节，抗战的决心，充溢于蒲风的抗日诗歌。除了诗歌，还有人们所熟悉的《八月的乡村》、《生死场》、《没有祖国的孩子》，以及报告文学《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

《中国的一日》、《上海的一日》、《活的记录》，等等。它们或者真实地记录现实，或者表现亡国的痛苦，或者揭露侵略者的凶残暴虐、统治者的荒淫腐败，或者歌颂我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武装反抗日寇的英勇斗争，总之，无一不是讨日的檄文，无一不是抗日的颂歌。

日本帝国主义是当时中国的主要敌人。左翼文艺工作者把揭露、批判、反抗的矛头对准这个穷凶极恶的主要敌人，使文艺的面目为之一新。那反映工人生活、工人斗争的作品，那描写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痛苦的作品，那表现华侨生活、述说异域风光的作品，都或多或少、或明或暗地包含着反帝的因素；就是以知识分子为主要对象的作品，如《倪焕之》，它的反帝思想，不也是给读者强烈的感染吗？看到民族资本与帝国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看到官僚买办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私生子，看到殖民地上的一批帮闲文人不过是洋大人豢养的宠犬，看到祖国山河破碎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看到国民党反动政权以帝国主义为靠山，这正是左翼文艺深刻的表现，是左翼文艺比之于“五四”文艺前进了一大步的一个标志。夏衍的《包身工》，四十多年来，所以一直脍炙人口，就是因为它通过对一群没有任何人生自由的女工的悲惨遭遇的叙述，深刻地挖掘了她们被压榨被奴役的根源。包身工“芦柴棒”卖身为奴，毫无人生自由可言，这遭的是封建法西斯主义的罪；现代工业先进技术的管制，过着一种“没有光，没有热，没有温情，没有希望……没有法律，没有人道”的人间地狱式生活，这又是因为她身上捆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绳索。作品就这样把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文学作品的主题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有的作者尽管在三十年代还写“五四”的主题，但已经注进了新的内容。比方

说反封建，“五四”时期主要是“父与子”两代的矛盾，如何冲破封建宗法家长制的藩篱；到了三十年代，就着重在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即或还是婚姻恋爱，但已经有了新的时代特色，不再是娜拉出走了。研究三十年代左翼文艺创作在主题思想上的这些特点，有助于全面理解它的历史功绩，总结于今天仍然有用的经验。

二、题材的丰富多样

中国新文学的头十年，从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到蒋光慈的《短裤党》，从郭沫若的《女神》到朱自清的《背影》，从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到郑伯奇的《抗争》，不管它以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出现，都深刻地反映着社会本质，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作品的题材也涉及到各个方面。但总的倾向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尤其是青年男女的婚姻恋爱，占了那一时期的创作的极大比重。正如茅盾所概括的那样：“鲁迅而外的作家大都用现代青年生活作为描写的主题了。郁达夫的《沉沦》，许钦文的《赵先生的烦恼》，王统照的《春雨之夜》，周全平的《梦里的微笑》，张资平的《苔莉》等，都是卓越的例证。但是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生还是极狭小的，局部的；我们不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出‘五四’以后的青年心灵的震幅。”^①“四一二”前后的革命加恋爱是一个过渡：由以婚姻恋爱题材为主过渡到以农村和抗日题材为主。这是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制造惨绝人寰的惨案的结果，是共产党人重新举起革命火炬、单独领导革命的体现。环境是那么恶劣，社会是如此黑暗，还只在个人的圈子里为情爱而忧郁悲伤就太不合时

^① 茅盾：《读〈倪焕之〉》，一九二九年五月《文学周报》第八卷第二〇号。

宣了，于是在恋爱之上罩上了一层革命的灵光，所谓革命和恋爱的冲突。革命者以革命克服情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则为了情爱而放弃革命，牺牲革命，甚至出卖革命。如洪灵菲的《转变》、《前线》、《流亡》，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的《两个女性》、《寒梅》（《地泉》第二部）等作就是。然而，爱情的甜蜜或烦恼，家庭的和谐或争吵，究竟不是人生的主要内容，更不是十年内战时期的主要特点。因此，尽管王曼英冲出云围，而重新“露出自己皎洁的玉面来。云块……将偌大的蔚蓝的天空，完全交与月亮，让它向着大地展开着胜利的，光明的微笑”^①；尽管在沈之菲面前，“显然分出两条大路来。一条是黑暗的，污秽的，不健康的，到灭亡的路去的！一条是光明的！伟大的！美丽的！到积极奋斗、积极求生的路去的！他脸上溢出一点笑容，他最后的决心，似乎因他的情人这封信愈加坚定了！他站起身来，挺直腰子，展开胸脯昂着头”，吟着豪迈的革命诗句，重新走上征途^②；这些色彩瑰丽的涂饰确也一时振奋了青年的精神，从沉沦中拯救出一部分青年，不过，这毕竟仅仅是水中的明月，雨后的彩虹，它看得见而捞不着，它闪着光却要消失。正因为如此，张天翼、魏金枝、蒋牧良、周文、葛琴、沙汀、艾芜的出现，才受到那么热烈的欢迎；丁玲的转变，才引起如此的重视。有鲁迅、郭沫若、茅盾这样的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做骨干，又成长起来一批新战士，使文坛的面貌为之一新。

左翼十年，革命文学反帝反封建的主题深化了，取材的天地也扩大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十年中，现实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文学中得到了表现。农村题材的显著突出，抗日题材的大量涌

① 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北新书局一九三〇年四月第四版，第二八三页。

② 洪灵菲：《流亡》，现代书局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初版，第二五〇页。

现，已如前述。知识分子仍然是革命文学的描写对象。茅盾的《蚀》三部曲，反映大革命前后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思想状态，消极成分多了一些；柔石的《二月》中的主人公肖涧秋则是“冲锋的战士”，“他想有为，怀着热爱”，然而又“有所顾惜，过于矜持”^①；到胡也频笔下，象施洵白和刘希坚，就有了更多的光彩。“一二八”以后，尤其是“华北事变”以后，出现了题材相同，内容大变的情况，同样是写知识分子的题材，但革命和恋爱的矛盾早已被抗日和亡国的矛盾所代替。另一个变化是，一些作品中的知识分子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出现的。施洵白人格高尚，对党的事业坚信不移；刘希坚学过革命理论，在客观事物面前比较清醒，踏踏实实工作，生活在群众之中，又站在前列领导群众运动，最后从城市去到农村，走上了正确的道路。鲁迅的散文《忆韦素园君》、《为了忘却的纪念》，情思哀切，寓意深远，抒革命的情怀，是青春的颂歌，是血泪的结晶，是写知识分子的典范。这些都充分说明着同样是知识分子题材，而在寓意上却有本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受革命深入时期的时代特点所制约的结果。

张天翼、蒋牧良和欧阳山的部分小说，写小市民的灰色人生，讽刺中流社会的无聊生活，为革命文学的取材开辟了多方面的领域。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是有口皆碑的名篇。小说写一个大公馆的仆役老包望子成龙的故事。他省吃俭用、借债求人送儿子包国维上学，希望儿子读了书也爬上上流社会，摆脱卑贱的奴隶地位。不料儿子被纨绔子弟引诱，日渐堕落，被学校开除；晴天霹雳，打破了老包的幻想，他仍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这就深刻批判了和讽刺了小市民向上爬的思想，无情鞭挞上流社会的诸多罪恶。蒋牧良的《集成四公》，塑造了一个土地主的生动形象。

^① 鲁迅：《三闲集·柔石作〈二月〉小引》，《鲁迅全集》第四卷第一一八页。

集成四公具有一切地主用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农民、用手中的权利压迫农民的共性；作者又写他“土”，赋予他显明的个性。他在路上看见一堆狗屎，立即用荷叶包回去，放在自己的地里；他抢了寡妇的肥猪，在偷杀时，喷了一点猪血在地上，赶快唤自家的大肥狗来舔食。这是很有点莎士比亚笔下的夏洛克、莫里哀剧里的阿巴贡和果戈里书中的泼留希金的味道吗？中国是个封建社会历史很长久的国家，又幅员广大，交通不发达，那种没有见过市面的“集成四公”，不是到处都有吗？包氏父子是通都大邑、殖民地上的一种典型，集成四公是闭塞乡村、封建经济制度下的另一种典型。同样是讽刺，因为对象不同，态度便有别，张天翼是含着热泪讽刺包氏父子的不觉悟，批判奴才思想；蒋牧良则是辛辣的嘲弄，把集成四公的肠肝肚肺都展示给人看。讽刺的生命是真实，在现实世界中有那样的人，有那样的事，只不过不集中，不典型，没有人注意；高明的作者从中截取一个画面，将本质之点加以突出，甚至使之漫画化，就构成讽刺。读者在捧腹大笑之后，自然要起来扫除这些垃圾，挖掉这些毒瘤，因而讽刺文学具有它的社会作用。

工业生产、工人生活方面的题材是随着初期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进入左翼文学领域的。翻开创造社、太阳社的刊物和丛书，反映劳资关系，工人斗争的小说、诗歌、戏剧是很多的。有郭沫若的《一只手》、冯乃超的《抚恤》、龚冰庐的《炭矿夫》、华汉的《马桶间》、刘一梦的《失业以后》、冯铿的《突变》，……还可以开出许多篇目。但作为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初期文学创作者由于缺乏实际生活，在写这方面题材的时候是往往议论多于描述，说理代替了形象，存在着标语口号的缺点。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可贵的特点，那就是扑面而来的革命气息，洋溢着战斗的激

情。比方说，《一只手》，它以童话的外貌包藏着现实的核心。小说揭露资本的罪恶，描写工人的痛苦，赞扬工人群众的团结斗争，歌颂共产党员培克的先进思想和组织才能。瞎眼老人的话富于哲理，洋溢着理想；他在火中自焚，使人联想起《女神》中的凤凰自焚和再生：毁坏的是一个旧世界，在火中诞生的是一个新世界。殷夫的红色鼓动诗，也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从幼稚走向成熟。曾经严肃批评过标语口号倾向的鲁迅，这时却以无限的热情，高度评价了殷夫的诗歌：“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①革命家殷夫以将近二十岁的年龄，写出了《血字》，写出了《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写出了《我们的诗》和《我们是年青的布尔塞维克》。这些诗，将工人的阶级觉悟，工人的团结，工人的革命气概，工人的强大力量，都作了程度不同的表现。某些诗句，很能给人以伟美壮观，气势磅礴之感。难怪众家文学史著，都引用《决议》中的句子——

在幽暗的油灯光中，
我们是无穷的多——合着影。
我们共同地呼吸着臭气，
我们共同地享有一颗大的心。

决议后，我们都笑了，

^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白莽作〈孩儿塔〉序》，《鲁迅全集》第六卷第四〇二页。

象这许多疲惫的马，
虽然，又静默了，
会议继续到半夜……

明日呢，这是另一日了，
我们将要叫了！
我们将要跳了！
但今晚睡得早些也很重要。

还有：

我在人群中行走，
在袋子中是我的双手，
一层层一迭迭的纸片，
亲爱地吻我指头。

——《一九二九年的五月一日》

殷夫的这些革命诗篇，显示出工人阶级的宽阔胸怀和伟大力量，闪烁着理想的光芒。这是一个阶级在宣布旧世界的灭亡，这是一个阶级的伟大进军。主要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蒲风，也写过几首关于工人的诗，都各有特色。小诗《运转手》，绘出了火车司机全神贯注的形象：“手里执住轮机，两眼瞪着前面”，让火车“流过平原，蟠过高山；不让疏忽爬上心，不让疲倦贴住身”。几个动词用得何等形象、贴切！火车在平原上奔腾、在丛山峻岭盘旋出没，勾出了生动的画面，赞颂了工人阶级的力量；火车所以能“流”能“蟠”，能安全欢快地呼啸前进，又全赖开车人的全神贯注。虽是几句话的抒情小品，没有对生活的真切体验，是无论如何写不出来的。起初风格和张天翼有些近似的蒋牧良，不光写